

# 中国历代皇帝 对五台山佛寺的扶植

□ 张映莹

两汉之际佛教自天竺传入中国,最初的传播范围是在上层社会。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奉佛教的贵族是楚王刘英,第一个信奉佛教的皇帝是汉桓帝刘志。这些率先信奉佛教人士所处地位表明,佛教这一外来宗教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

东晋十六国时期的著名高僧道安曾说过:“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sup>[1]</sup>,这是对佛教发展方向的最经典总结。而佛教的传播者也深知,惟有依附于统治阶级,佛教才能推广,并享有合法地位,所以许多佛经最后的《嘱累品》中将“护持佛法”之事托付给“国王”和“大臣”。

历代统治阶级对佛教在巩固政权中起的作用也有充分认识。南北朝时期的宋文帝刘义隆说过:“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其目的是借助佛教之“神道”进行封建教化,使自己“坐致太平”;隋文帝杨坚说过:“律师度人为善,弟子禁人为恶,言虽有异,意则不殊”<sup>[2]</sup>,要利用佛教来“度人为善”;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授善世禅师诏》<sup>[3]</sup>中说:“佛教肇兴西土,流传遍被华夷,善世凶顽,佐王纲而理道,古今崇瞻,又慈心而愿重。是故出三界而脱沉沦,永彰而不灭”,其目的是为了化愚导顽、辅助王道、维护统治。这些出自不同时代统治阶级的话语表明了封建统治阶级要利用佛教来巩固自己的政权,这也是为什么历代皇帝对佛教予以扶植的最主要原因。

佛寺是佛文化的载体,是佛文化具象的一种,而且还是具象佛文化的集合载体。萧梁刘孝绰曾评论:“公卿贵士,贤哲伟人,莫不严事招提,归仰慧觉,欲使法灯永传,胜固长久”<sup>[4]</sup>。佛寺的建造从最初的自辟祸厄、自保家业的初级诉求,发展到福佑皇祚、维固宗族的高级需求。建造寺院不但是护法、弘法的需要,而且也是统治阶级祈愿保佑国祚的需要,隋文帝杨坚曾说过:“经始伽蓝,增长福固”,这就是历代统治阶级扶植佛寺、热衷佛寺营造的根本目的。

五台山佛教的肇始年代迄今仍无定论,但充足的历史资料表明,在北魏时期,五台山已公认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皇帝对五台山佛教予以扶植,五台山佛寺因此得以建造,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形成规模庞大的佛寺群和文殊信仰中心。

据《古清凉传》、《广清凉传》记载,孝文帝“曾至五台山避暑,往覆宿此(北台)”,又游行于中台,上置“小石浮图”,在清凉谷岭建造了清凉寺。又见中台东南三十余里“小峰顶平无林木,岿然高显,类西域之灵峰。其上祥云屡兴,圣荣频显,古谓之化文殊台”,故谓之灵鹫峰,遂“爰发圣心”,建大孚灵鹫寺,又于寺前种植花园二顷,并环绕灵鹫峰建造12座寺院。在孝文帝的开拓下,五台山佛教开始兴盛,寺庙营造也一道开始。

魏齐是五台山佛教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兴盛时



显通寺康熙皇帝御碑

期,《古清凉传·古今胜迹三》卷上记载:“爰及北齐高氏,深弘像教,宇内塔寺将四十千。此中伽蓝,数过二百,又割八州之税以供山众农药之资焉。”这一政策为五台山佛教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加上僧人的精心经营,五台山佛寺在短暂的二三十年间兴盛起来。但是随后发生的周武灭佛,使五台山佛寺遭到毁灭性打击,寺宇“罕有仆存者矣”。

公元581年,杨坚即位,史称隋文帝。开皇元年便下诏:“周朝废寺,咸与修营。境内之人,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sup>[5]</sup>《古清凉传》卷上记载:隋代“正教重兴,凡是伽蓝,并任复修”。《续高僧传》卷一五《总论》记载:“隋高荷负在躬,专弘佛教,开皇伊始,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又诏:“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寺一所,并赐庄田”<sup>[6]</sup>,五台山当在其内。

“正教重兴”的政策为五台山寺庙重建创造了机遇,一批灭法时逃匿的僧人重返五台山,开始了重建寺院的营造活动。开皇元年(581年)文帝“下诏五顶,各置一所,设文殊像,各度僧三千,令事焚修”<sup>[7]</sup>。五顶所建寺分别为东台望海寺供聪明文殊,南台普济寺供智慧文殊,西台法雷寺供狮子文殊,北台灵应寺供无垢文殊,中台演教寺供孺童文殊。这五台文殊合称五方文殊,成为延续千余年“大朝台”的重要膜拜内容。

唐代是五台山佛教历史的黄金时代。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而有天下,因此视五台山为“植德之所”。道宣曾说过:“皇唐勃举,义动天心,四海廓清,三宝云构,……度寺立僧,广事弘持”<sup>[8]</sup>,可见初唐时期就对佛教采取了积极的扶持态度,并影响了本朝以后诸位皇帝对佛教的态度。

唐太宗认为,“五台山者,文殊闍宅,万圣幽栖。境系太原,实我祖宗植德之所,尤当建寺度僧,切宜祇畏”,对五台山佛教多加护持。贞观九年(635年)于“台山建寺十所,度僧百数”<sup>[9]</sup>。

唐高宗遵从祖训,崇奉五台山佛教。据《清凉山志》记载:“显庆元年(656年)十月,敕有司,五台等圣道场地僧寺,不得税敛”,减免了五台山寺院的赋税,为五台山佛寺的兴盛奠定了经济基础。

武则天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非常重视佛教。《古清凉传·五台山境界寺名圣迹六》卷上详细记载了武则天扶植五台山佛教的活动。“敕万山寺尼妙胜于中台造塔,一年告竣”。《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记载:中台“中间一塔,四角,一丈高许。造

两边者团圆,并高八尺许。武婆天子镇五台所建也。”这里的武婆即是武则天皇后。另北台、西台、东台均有则天塔。显庆年间(656-660年)设僧斋,供万菩萨,忻州、代州巡礼僧数超过一万,普施一环钱,皆云“万圣赴会”,极大地资助了五台山佛寺的复兴。龙朔二年(662年),唐高宗和武后“敕西京会昌寺沙门会随共内侍掌扇张行弘等往清凉山检寻圣迹”,分别登临了中台和西台,礼拜了当时五台山著名寺院佛光寺、清凉寺、大孚灵鹫寺等,并根据灵迹分布和传说绘制了文殊化显图,还制成小帐(屏风),另撰述《略经》一卷。“化显图”、《略传》广行三辅,“清凉圣迹,益听京城,文殊宝化,昭扬道路”<sup>[10]</sup>,五台灵山之名昭闻天下。长安二年(702年),武则天神游五顶,同年在五台山造塔建碑,同时“敕并州刺史重建清凉寺”,并令德感国师主持,封其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主掌京国僧尼事。”从僧官制度上提高了五台山的佛教界地位,这是五台山在全国佛教界取得统治地位的开端,也是五台山在封建统治者护持下成为名山圣地的开始。

唐玄宗虽然对佛教采取限制和利用的政策,但对五台山佛教则是“丕宏妙教,大阐元宗”,“开元二十有八载,帝之元女永穆公主……奉为皇帝恭造净土诸像,钦铸铜钟一,骈之以七宝,合之以三金”,安置于清凉寺;又“即旧而增新,维新而趋构”<sup>[11]</sup>。唐玄宗复佛时,曾令天下“添置”寺院,而特命五台山与两京相同,即“添置”寺庙五所,每寺度僧50人,可见五台山的地位高于地方寺院,表明了对五台山寺院的扶持。

唐肃宗在位时间很短,是一位佞佛的皇帝,崇信五台山文殊菩萨。乾元元年(758年)“敕有司,五岳并五台山各建寺一区”。唐代宗将击败永泰元年(765年)吐蕃入侵、顺利返京之功归于文殊菩萨的佑助,于是下令修五台山文殊殿,造丈六镀金像。同年支持不空三藏法师于五台山修建金阁寺,凡十三院,“铸铜涂金为瓦,所费巨亿。”<sup>[12]</sup>同时先后重修了清凉寺、华严寺、佛光寺、玉华寺及法华寺,这六寺皆由皇帝书额。大历四年(769年)将长安光天寺东塔院作为五台山往来停止院,将五台山的佛教范围扩展到了长安。大历七年(772年)十月,批准不空三藏请敕,于京城天下所有寺院置大圣文殊师利菩萨院,塑文殊像,常年供养,把以五台山为中心的文殊信仰普及到了全国各地。

唐武宗李炎“自幼喜释氏”,但听信道士“非中国

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之谗言,认为“使我民穷困者乃佛”,遂于会昌五年(845年)下诏废佛,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五台山的寺庙普遍遭到严重毁坏。

会昌六年(846年)宣宗即位,次年并下令恢复废寺。大中二年(848年)正月下诏:“五台山宜置僧寺四所,尼所一所。如有见存者,使令修饰。”<sup>[13]</sup>“宣宗践祚,重兴寺宇,敕五台诸寺度五千僧,再请额(释智颙)为十寺僧首,并都修造供养主。”<sup>[14]</sup>宣宗在位的十余年间,五台山恢复佛寺百余座。

对于唐代诸多皇帝优礼五台山政策和行为,《华严钞》予以记载:“大唐,始太宗至德宗,凡九帝,莫不倾仰灵山,留神圣境。御札天衣,每光五顶。中使香药,不断岁时。至于百辟归崇,殊邦贡供,不可悉记矣。”唐朝廷“常例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到山,表施十二大寺”,还敕五台山佛寺“细披五百领,……袈裟布一千端,青色染之,香一千两,茶一千斤,手巾一千条”<sup>[15]</sup>供山众生活、法事之需。

五代时期的五台山的佛教仍延续唐代佛教兴盛的余绪。北汉世祖刘旻即位后,因国用拮据,请真容院僧人继颙资助,继颙拿出积蓄以佐国用,挽救了北汉政权的财政危机。睿宗于乾佑七年(954年)即位,天会七年(961年)诏授继颙为“五台山十寺都监,赐师号广演匡圣大师、鸿胪卿,参与国政”<sup>[16]</sup>。继颙广纳布施,兴建了真容院四面廊庑及华严寺楼阁,还塑造山龛罗汉三十二堂。

北宋王朝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年)建立政权之后,对佛教采取了适当保护、利用和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但对于五台山的佛教则是优礼相待。据《清凉山志》卷五记载,从“太宗至仁宗,三代圣主,眷想灵峰,流光五顶,天书玉札,凡三百八十轴,恢隆佛化,照耀林藪。清凉之兴,于是为盛。”鉴于太祖崇佛敬僧,保护佛教,遂使本朝以后诸帝也维护佛教。

宋太宗在位期间,沿袭太祖利用佛教的政策。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赐天下无名寺额为“太平兴国”。刚刚平晋,就诏见了五台山鹿泉寺沙门睿谏,并令建太平兴国寺。同时下诏:“五台深林大谷,禅侣幽栖,尽蠲税赋”,“每岁度僧五十人,令事清修”<sup>[17]</sup>,从经济、人力、物力上支持五台山的佛寺。据《佛祖统纪》卷四十五记载: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正月,太宗令“内侍张延训往代州五台山造金铜文殊万菩萨像,奉安于真容院”;又“诏修五台十寺,以沙门芳

润为十寺僧正”。为了加快修建寺庙速度,又“遣使蔡廷玉等,诣台山建寺”,并“敕河东路有司运给”<sup>[18]</sup>,为寺庙营造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十寺修缮工程结束后,各寺雕梁画栋,焕然一新。

宋真宗于景德四年(1007年)敕五台山真容院建造重阁,设文殊像,又赐额“奉真阁”。据《广清凉山传》记载,宋代五台山有寺庙73座,寺庙数量仅次于唐代。

金朝在灭辽和占领宋都汴京后,接受了辽、宋两代社会盛行的佛教习俗,尊崇佛教,“奉佛尤谨”<sup>[19]</sup>。金代诸帝和女真族都倾仰五台山,把五台山当作神灵居住之所,顶礼膜拜,遂使五台山的佛教有所发展。金天会十五年(1137年),在五台山佛光寺修建了文殊殿,表示对五台山佛教的尊崇。

金世宗时,“天下鸿宁,释教大兴”,大定三年(1163年)敕建五台山万岁寺。大定年间(1161-1190)年于五台山新建了平章寺,重修了净名寺。金代于京城设国师,帅府设僧录、僧正,县级设维那。而对于五台山,别设僧官,专门负责五台山寺院,以示对五台山佛教的礼遇。

元世祖忽必烈崇尚释氏,以后诸帝莫不倾仰释氏。元至元年(1264年)曾诏:“朕眷仰灵峰,大圣所宅。清修之士,冥赞化机。官民人等,不得侵暴……次年为福帮民,十二佛刹,皆为葺新”<sup>[20]</sup>,五台山寺庙得到不同程度的兴建和修缮。

元成宗铁木耳在位期间,效仿世祖崇佛敬僧之遗风,敕赐金帛于五台山建寺。元元贞元年(1295年),成宗“敕建万圣佑国寺”<sup>[21]</sup>,同年“闰四月,丙午,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台山,以前工部尚书涅只为将作院使,领工部事。燕南河北道肃政廉访使宋德柔为工部尚书,董其役。以大都、保定、真定、平阳、大同、河间、大名、顺德、广平十路,应其所需”<sup>[22]</sup>,对五台山佛寺营造予以极大支持。

元武宗在位时间(1307-1311年)益加恩宠五台山。大德十一年(1307年)即位,同年八月敕“建佛阁于五台寺”,十一月又“建佛寺于五台山”。至大元年(1308年)二月“发军千百人修五台山佛寺”<sup>[23]</sup>,十一月,皇太后又“造寺于五台山,摘军六千五百人供其役”<sup>[24]</sup>;至大三年(1310年)春正月,再次增派军卒工匠“营五台山寺,役工匠千四百人,军三千五百人”,先后参加营造五台山佛寺的人达一万二千五百人,可见五台山佛寺营造工程之巨大。

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驾幸五台山,



“至王子寺,有感,敕重修葺。是年复建普门寺”。

元泰定二年(1325年)二月,泰定帝“赐建殊像寺于五台山,赐田三百顷”。

元代九帝一主,就有七帝尊崇佛教,倾仰五台山,于台山造塔建寺,布施金币,极大地促进了五台山寺庙的兴盛。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从小无所依,入皇觉寺为沙弥,八年的僧侣生活使他深受佛教的熏陶,在位期间崇奉佛教。“洪武六年,普给天下僧度牒,废前代鬻牒度僧”<sup>[25]</sup>,为出家之僧大开方便之门。洪武十九年(1386年)“敕天下寺院有田粮者,一应差役不许僧应”<sup>[26]</sup>,免粮免差政策维护了寺院经济,五台山佛寺也因之受益。

明成祖在夺取天下之时曾得到僧人道衍的帮助,所以对佛教特别尊信,永乐初罢“僧道限田制”,进一步促进了寺院经济的发展。明成祖视五台山为灵山圣迹,永乐五年(1407年)命太监杨日升重修寺宇及舍利塔(即大白塔),工程完竣后将塔院寺从显通寺分离出来。又以“山寒地僻,五谷不生,乞化难

艰,命该县月给僧粮”,从经济上对五台山寺院予以支助。

明英宗继承先志,崇信佛教。天顺二年(1458年)敕谕护持五台山显通寺,诏曰:“凡本寺及合山诸寺,不许一应官员军民人等侵扰,以沮坏其教,违者以法罪之”。

明宪宗于成化十七年(1481年)敕建五台山文殊寺。为了为圣母祈安,明宪宗造镀金文殊像,高一丈六寸。并画佛百轴,香金五百两,布帛千疋,念珠万串,送五台山文殊寺供养。

明武宗尊崇佛教,正德二年(1507年)敕建五台山铜瓦殿,赐额广宗寺;正德七年(1512年)春于中台建寺,铸铁为瓦,并赐额演教,敕旨护持。

明神宗重兴佛教,修建寺宇,五台山寺庙得到了较大程度的修缮。《清凉山志》卷五记载:万历七年(1579年)“为穆考荐福,今上祈储”,敕建“大塔院寺并护国佑民释迦文佛舍利宝塔”;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于狮子窝修建洪福万寿藏经楼阁;次年于龙泉寺复建万圣阁,同年修复五座台顶寺庙;万历三



显通寺康熙皇帝御匾



塔院寺大慈延寿宝殿内嘉庆皇帝御匾



显通寺光绪皇帝御匾



菩萨顶康熙皇帝御匾

十四年(1606年)又敕建显通寺。一系列的修复营造使五台山寺庙又焕然一新。

清代的十位皇帝大多崇佛敬僧,特别是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帝尤尊五台山佛教。从康熙开始,“国家绥柔蒙古,特兴黄教。……而清凉五顶以近邻郊圻,岁或再至。怀柔最先,所以迓休祥而普乐利者,典尤巨焉”<sup>[27]</sup>。康熙五次朝台,修建寺院20余座,赠送渗金菩萨像八尊,御题匾额55块,做诗15首,御制碑文20余通。

乾隆皇帝认为黄教“不可不保护之,以为怀柔之道而已”。为了达到利用藏传佛教怀柔蒙藏民族的目的,采取广建寺院的举措。乾隆皇帝先后六度朝礼五台山,每次朝台都重葺寺庙,“在五个台顶者为演教寺、望海寺、法雷寺、普济寺,在菩萨顶者为文殊寺,在台怀者为显通寺、殊像寺、罗睺寺、广宗寺、寿宁寺,其外还有碧山寺、涌泉寺、栖贤寺、镇海寺、白云寺”。乾隆皇帝六次朝台,沿途建造了二十一处行宫。乾隆二十六年(1687年),巡抚鄂弼于菩萨顶为乾隆建行宫,所需费用二万两从公项内拨付。擅长书画的乾隆皇帝为五台山寺庙赐诗题匾、制碑较多,仅乾隆十四年(1749年)春就御制五台山碑文八篇,御题五台寺庙联额51块。较著名的有菩萨顶的汉

白玉四棱碑。

嘉庆皇帝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巡幸五台山,并赏赐五台山修理庙宇宫银二万两。

五台山佛寺在中国历代皇帝的大力扶植下,加上五台山历代高僧硕德的辛勤经营和僧徒的极力营造,最终形成规模庞大的中国古代寺庙建筑群,承载着厚重的佛教文化,成为天下学佛道者的参学圣地和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同时还成为世界佛教徒心目中的佛教圣地。

[1]《高僧传》卷五《道安传》,《大正藏》卷五〇,第351页。

[2]《续高僧传》卷二一《灵辩传》,《大正藏》卷五〇,第610页。

[3]《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4]刘孝绰《栖隐寺碑》,见《全梁文》卷60。

[5]《佛祖统计》卷第四十。

[6]《大正藏》卷四九,第809页。

[7]《清凉山志》卷五。

[8]《大唐内典录》卷五《皇朝传译佛经录》第一八,《大正藏》卷五五,第280页。

[9]《清凉山志》卷五《帝王崇建·唐太宗》。

[10]《古清凉传》卷下。

[11]李邕《五台山清凉寺碑》。

[12]《资治通鉴·唐纪·代宗二年》。

[13]《唐会要》卷四十八。

[14]《广清凉传》卷中。

[15]《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16]《十国春秋卷》一百零五《北汉二·睿宗本纪》。

[17][18]《清凉山志》卷五。

[19]《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20]《清凉山志》卷四。

[21]《凉国敏慧公神道碑》。

[22]《元史·成宗纪一》卷十八。

[23]《元史·成宗纪一》卷二十二。

[24]《元史·成宗纪一》卷二十三。

[25][26]《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

[27]雍正版《山西通志》卷八十一《巡幸记》。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古建筑保护研究所)



菩萨顶汉白玉四棱碑